

□历史回眸

他亲身聆听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教诲

□华光



1959年9月，王喜民在北京天安门前留影

过年了，省市各级领导又来到全国劳模、枣庄煤矿退休工人王喜民老人家中走访慰问，为他送去了节日的祝福。在100多平米的温暖的新房里，王喜民老师傅高兴地说：“感谢党，感谢政府，还一直想着我们这些煤矿工人！”

今年83岁的全国劳模王喜民永远忘不了57年前在祖国的首都北京，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的谆谆教导，更忘不了他与周总理共进晚餐的情景。

王喜民，生于1933年，1949年6月到枣庄孔庄煤矿当了一名采煤工人。刚参加工作的王喜民在煤矿这个苦、脏、累的岗位却干得格外的满足，年轻的他总是风风火火，干活冲在前、吃苦抢在先，并很快地掌握了采掘机运通各个环节的生产运作技术，很快在同期参加工作的青年中脱颖而出。他从一个普通煤矿工人逐渐成长为生产班长、井长，最后被任命为生产副矿长。特别是任生产班长时，他奉献公休，打连班，拼命大干，班班超额完成任务。当时计划班产180吨，他



现今，王喜民老人每天坚持读书看报

带领的班组最高产量高达600多吨，连年被矿上评为先进班组。1959年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1959年国庆节前夕，26岁的煤矿工人王喜民作为枣庄市唯一的煤矿工人代表，被当时的济宁地委选拔到北京参加全国工业交通基建财贸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先进生产者表彰大会。9月13日晚，在北京西郊宾馆入住的劳模有60多名接到会议工作人员告知，第二天毛主席将接见参加会议人员部分代表。被点到名字的代表激动地一宿都没有睡觉，王喜民更是心潮澎湃，一次次把自己的



1959年全国工交财贸系统先进表彰大会召开期间，王喜民(前数第二排中)与其他劳模代表合影

八角帽褶子捏平整，一次次地整理自己的蓝布中山服。这一夜真漫长啊，好不容易9月14日早晨8点，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全国各个地区各个岗

我激动地语无伦次，浑身出汗。”

他把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教导时刻记在心上，回来后更加努力地工作。1961年9月，为减少工人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济宁专署挑选两人到四川永兴煤矿进行为期一周的煤矿革新技术学习，他克服文化水平低、技术底子薄的种种困难，不分白天黑夜，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回来后，他把所学的知识灵活的应用到工作中，积极钻研。为了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针对枣庄地区煤矿的特点，他创造了把用锤打眼改为半机械化的拉木式打眼。这种方法当年应用到工作中，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他还凭着持之以恒的钉子精神和孜孜不倦的创新实践，经过多次艰苦的钻研，把以人拉筐的人工运输，改为铺设木轨，实现了木车木轨的“运输轨道化”。他还把井口推磨车的提升，改造成了用绞车拉，实现了“提升绞车化”，这两化与井下运煤车拐弯“转盘化”并称“三化”，在当时的煤矿系统得到了普遍的推广，大大减轻了井下煤矿工人的劳动强度。

王喜民说：“我从小没有上过一天学，13岁就在时任农协会会长的父亲的

影响下加入了村里的共产儿童团。手拿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当时共产党组织经常派地下人员在村西头的山坳里与父亲接头。父亲接受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同时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开展情况。他从来不愿带我去，有时实在拗不过我也只是远远地让我站在一边，从不让我靠近。解放后村里办起了扫盲班，我每天晚上拿着煤油灯学习两个小时。村中读过私塾的人教学，这样我才认识了几个字。”说起近年来枣庄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老人有着切身的感受。老人回忆，他家六代是枣庄矿工。解放前井下的采煤设备和工作条件都十分简陋，与现在的数字化矿井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生活条件就更加艰苦，他姊妹七人，两个妹妹先后饿死，其他的都要过饭。五个孩子和父母全家7口人住在一间十来平方米的破屋里，吃的是地瓜干窝头，就这样还不够吃。没有共产党哪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老人说从前枣庄哪有什么，“一条马路一盏灯、一个警察半个兵、一个花园三角形、一个喇叭全城听、一把花生吃满城。”是老枣庄的真实写照。现在从自己家里到整个枣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一片片棚户区现在都盖起了楼房，老人告诉笔者：“这次市里棚户区改



王喜民所获奖章

造，我家摊到了四套房，这不，因为新房子有暖气，我们年前装修完就搬过来了！”老人五个孩子，大二、二儿都在矿上，三儿当兵，当年奔赴越南战场，参加了自卫反击战，任侦察班长，跟随连长到阵地前沿侦察，不料一枚炮弹袭来，连长被炸得血肉模糊，当场牺牲。其三儿身上左半部分中弹，一只眼炸瞎，腿炸断，后被国家评定为一等伤残军人。为了减轻国家负担，不吃国家救济，三儿子在枣庄矿八区大门口开了一个小卖部自食其力。老人说，他现在每天都看新闻联播和省市新闻，天好时还坐着市内公交或BRT到外面转转。他经常告诫儿孙们：“要好好工作，好好为人民服务。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

□老城旧事

祖父的照片

□高炯浩



高熙喆 先生

当读者读到这篇散文的标题，一定会大不以为然，祖父的照片？谁家会没有几张或一册影集呢！然而对我家来说，他老人家的照片仅有一张绝版，而这张绝版又饱含着多少世事的沧桑和人生的蹉跎啊！

在老家山东滕州，提到祖父高熙喆老先生，老辈人和文化人都很了解和熟悉，因为山东省志、枣庄市志、滕县县志甚至清史中都有他老人家的条目。滕县晚清年间50年才出一个翰林，这对于一个崇尚文化的历史古城来说，无疑曾经轰动一时。当然更重要的是，老人在官品、人品、文品上堪称表率，尤其在抗日战争民族危难之时，老人所表现出的民族气节、誓死不与日寇汉奸为伍的精神被乡人景仰。

少不更事时，春天常跟上哥哥去到郊外麦田坟地放风筝，小解急了，便随便躲进坟地的石碑背后小便，哥哥便喊住我，说不敢在碑后小便，因为正面碑文是咱祖父写的。他面对碑文向我读道：“赐进士出身清授朝议大夫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光绪甲午科山西正考官殿试同考官掌贵州湖广道监察御史工科给事中宣化府知府滕县高熙喆。”哥哥指着“高熙喆”三个字告诉我，这就是咱爷爷的名字。当时对祖父所有的头衔我都弄不明白，惟独祖父的名字我牢牢地记在心了。

后来上小学了，老师给来人介绍说，这孩子便是高翰林的孙子。听的人便很亲热地过来拍拍我的头，问问目前家庭状况。我隐约觉得，祖父是个受人尊敬的人，给他当孙子是个光荣的事。

到了高小时，偶尔打开了母亲常常锁着的箱子，翻到一迭旧年照片，虽然有些发黄了，但很引人注目。其中一张集体照，三排人都穿着长袍马褂，前排中间一人留山羊胡，面目清癯，瘦且高大。哥哥指着这名老者说，这就是咱爷爷。周围的我只认识三五个。还有一张是母亲出嫁的照片，穿着旗袍，十分典雅，想不到母亲年轻时竟那样美丽。还有一张在上海的几个姐姐的合影，哥哥指着一个小年轻女子低声说，这是咱大姐，随着姐夫杨孟才（张锦湖之子）去了台北。我听了既感到神秘，又感到好奇。

随着冬去春来的岁月，我一天天长大，转眼到了“少年已知愁滋味”的年龄，在那个“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的年代，16岁的我既失了学，又找不到“业”，只好亡命西域了。整整一个“家”丢在了滕县，临行带点什么出逃

呢？早熟的我拣了一本箱书和上辈们的一迭照片，我隐隐地感觉，这些对我来说是最为珍贵的。

初到新疆兵团试工时，我天天累得贼死，每天500块土坯任务，为了能留下当个工人，我必须拼死去干。那些照片便压在箱子底层又用大信封糊起来。终于平安地保存到了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地震般地滚动而来，经过了“四清运动”的我，已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些照片成了“四旧”，放在宿舍的箱子里，肯定不安全。然而血浓于水，那是我祖父、母亲及姐姐们的照片啊，我决定把“他”转移到二姐家，她是1952年参军的女兵，又住在师机关，也许保险些。

然而这一举动造成了终生遗憾。“革命”转移到斗争“走资派”，风头稍弱时，我向姐姐索要那些老照片，姐姐告诉我，在她拿到照片的当天晚上，便别无选择地投到了火炉里。她的回答差点让我晕了过去！然而在当时，这也许是惟一的方式。

那场“革命”究竟破坏了多少中华瑰宝和历史文物，实在是难以胜数，我家珍贵照片的销毁，只是一个平民百姓之家的小小悲剧！

1984年回滕县，已是春风化雨、艳阳高照的和谐时代了。接待我的旧友王中，不期把我带到了县史志办公室，适逢小学同学程春生在那里工作，20多年未见，他竟认出了我，除了回忆了阵少年往事外，又把我介绍给了他的主任吴殿俊先生，吴主任一听是高翰林后人，便特别客气，并抱出太史公（祖父因在清朝国史馆编史，人们又称其为高太史）编纂的《续滕县志》和《滕县乡土志》让我看，吴主任还讲起当年翰

林爷为躲避日寇愤而从东门离城的情景。当时，吴主任提出要一张太史公的照片，作为资料保存。然而我这不肖子孙竟连这件小事都办不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离别40年的台湾大哥回大陆探亲，我讲起祖父照片的事，想不到大哥说大姐妣云处有，我听了惊喜得差点跳了起来，经过时代变幻，风雨飘零，有一个后人竟保留住了老人的照片。这该是何等的令人欣喜啊！

后来探亲时，大哥果然从台北带回了祖父的照片，然而先去滕县看望叔伯哥高旭初时，留在了旭初兄那里，我们怕旭初兄在邮寄中丢失，便通知他妥善保存，等兄弟们回滕县时亲手请回。

今天，这张原照便供奉在太史公小孙子高炯浩的客厅里，加印的便寄给太史公嫡亲孙辈，每家一张。照片大约留影于19世纪末，太史公在京城任朝议大夫、翰林院编修时期，年龄大概50左右。炯云祖得此照片大约是1933年，她自嫁到上海花园（张锦湖公馆），便很少回滕县了。

当然最为遗憾的还是祖父那张集体照的丢失。那是张30年代滕县名流聚会时的留影。如果让90岁的老人指认，里边肯定会有滕县抗日英雄孔昭同先生（南门里老宅邻居）、李子丹先生、杨士元师长，书法家黄以元、教育家陈慕堂、实业家徐蓝舟（我表爷爷）和王纪龙先生（俗称“大王祠”，王翰林五世孙。以上多人为民国年间“滕县八大家”成员）。试想，那该是滕州史学界多么珍贵的一份史料啊！

祖父的老照片辗转了60多年，一万多里终于回到了孙辈手中，其中的酸甜苦辣惟我等方知啊！



□记忆

难忘的乡村年戏

□马西良

人的一生犹如一条记忆的长绳，许多的地方都会打有不同的绳结，每个绳结都留下了我们许多美好的回忆，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越来越模糊，只留下许多似是而非的片段，在回忆里浮来浮去。当一天到晚围坐在电视机旁，观看着电视节目的时候，我们不禁会想起过去在农村过年时看戏的热闹场面：村内的打麦场上，一盏盏汽灯高高挂起，几个木头搭起的戏台，舞台上刀枪剑戟锣鼓喧天，嬉笑怒骂插科打诨。戏台下人头攒动水泄不通，冰天雪地北风呼啸仍然洋溢着热闹的气氛。

鲁南地区自古就有听书看戏的传统。“烟袋窝子羊肉汤，绿豆花子拉魂腔”，过去被称为农村“四大香”。在秋收入冬农闲时间，村里就专门挑选一些戏曲爱好者，组成文艺队，利用村内的办公室或学校，组成庄户剧团，演一些传统剧目，如《打金枝》、《喝面叶》、《穆桂英挂帅》、《张郎与丁香》、《姊妹易嫁》等柳琴戏、豫剧等曲目。锣鼓家什一敲，便开始排演起来。经过一个冬天的排练，就等春节过后开演。

农家人辛苦一年，就是年后没有开春之前这段时间是个空闲，春节不愁吃喝，这里走亲那里访友，天天喝得晕晕的。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歌厅等场所，看戏成为年后最好的娱乐项目。

听戏是年后最惬意的一件事。吃过初一的饺子，那就要转入听戏的环节，人们互相之间要打听，哪个村年后要演戏，演什么节目。农村听戏一般都是分为白天一场，晚上一场。从大年初一到十五在附近的各个村庄轮流上演。吃过午饭不久，大人孩子们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心神不宁地跟着村人的脚步。舞台上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让人感到新奇，演员们俊美的脸庞、五彩的戏服、如云的浓发和满头乱颤的发饰，尤其是如痴如醉的描眉画眼唇涂朱砂的女人们，他们像仙女一样迷恋着观众的目光。华衣彩袖浓妆淡抹，唱念做打一招一式，轻轻巧巧小碎步，威武夸张武打生，横波流盼勾魂眼，含媚娇态翘指尖，都是视觉的盛宴。婉转柔肠千百回，哭也动听笑也入心。才子佳人如花美眷，句句声声催人泪，嬉笑怒骂惹人怜。一唱三叠，一咏三叹，丝丝袅袅，撩人心魄，余音绕梁，久久不息。红尘里世态炎凉分分合合繁华锦绣失意落寞，皆可以化作心头一缕香，在纷纷扰扰里轻轻飘过。

唱戏不光丰富了农民的精神生活，还为人们走亲戚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农村人一年中都很忙，平时很少走亲戚，但唱戏时都会到姑姑家、舅舅家转转，既看了戏，又转了亲戚。唱戏前，本村上的人也会尽一尽“东道主”之谊，把各位亲戚朋友叫一下，告诉唱戏的时间，请他们来看戏。

戏唱起来，全场几百号人鸦雀无声，那眼神那表情，跟随戏中人物和情节的发展，跌宕起伏，神情迥然。演出的每折剧目，无论是诸葛亮、岳飞、韩信，还是白蛇、花木兰、穆桂英，村民们都如痴如醉，却不高声表露，只是低声啧啧称赞。孩子们听不懂戏，对戏也毫无兴趣，全都挤到后台，探究其中奥妙。原来戏台上那些英俊威武的武生，竟是颇为俊秀的女子所扮，那唱腔高亢圆润，那扮相刚中有柔，是男人们比不了的。

迎雪看戏确实极有景致，台下一溜儿竹椅木凳深陷雪中，人们脚下的一片雪地被压得结结实实。雪白，衣红，头巾鲜艳。戏台上打斗娴熟，热闹无比。那山那树那原野，洁白无垠，寂静空阔，把催戏的锣鼓道染得跌宕起伏，经久不息，山乡新年也陡然增添了几分灵气。

唱戏也是一些小商小贩的最爱，他们知道戏场里蕴含着不小的商机，便早早地打听到唱戏的时间，做好准备来“赶戏”。卖日常用品的、卖衣服的、卖布的，各种摊点沿街一字型摆开，各种叫卖声和着喇叭里的拉魂腔声，形成了一首韵味独特的协奏曲。看戏、跟集的人享受着这种人挤人的热闹场面，儿童们混在其中，钻来钻去，看看那看，感受着“看戏”的乐趣。那俊男靓女一帮一伙更是村村到，场场不落，在嬉笑打闹中结识新朋友，成就了一对对好姻缘。

年戏，是乡里人一年中最值得回味的视觉和精神盛宴。

